

影响

YINGXIANGXINZHONGGUO60NIAN
JINGJIJIANSHUDE
100WEIJINGJIXUEJIA

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

100位 经济学家

吴太昌 张卓元 吴敬琏 厉以宁 刘伟 主编

8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經濟出版社

影响

YINGXIANGXINZHONGGUO60NIAN

JINGJIANSHUDE

100WEI JINGJIXUEJIA

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

100位 经济学家



吴太昌 张卓元 吴敬琏 厉以宁 刘伟 主编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影响新中国 60 年经济建设的 100 位经济学家. 8 / 吴太昌, 张卓元, 吴敬琏, 厉以宁, 刘伟主编. —广州: 广东经济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7—5454—0166—0

I. 影… II. ①吴…②张…③吴…④厉…⑤刘… III. ①经济学家—生平事迹—中国②经济—中国—文集 IV. K825. 31
F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8591 号

出版 发行	广东经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11~12 楼)
经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
印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开本	73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张	33.75 2 插页
字数	531 000 字
版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
印数	1~3 000 册
书号	ISBN 978—7—5454—0166—0
定价	6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发行部地址: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11 楼

电话: (020) 38306055 38306107 邮政编码: 510075

邮购地址: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11 楼

电话: (020) 37601950 邮政编码: 510075

营销网址: <http://www.gebook.com>

广东经济出版社常年法律顾问: 何剑桥律师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论证及编辑委员会成员（以姓氏拼音为序）

蔡 昉	黄 达	黄范章	贾 康	李晓西
厉以宁	林兆木	刘 伟	王 诚	王一鸣
吴太昌	吴敬琏	赵海宽	赵人伟	周叔莲
郑红亮	张问敏	张永山	张卓元	

前 言

200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六十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我国经济学家们在其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在诸如人口经济理论、商品经济理论、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改革、所有制结构调整、引进外资、宏观经济管理、经济发展战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收入分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金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资本市场发展、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及经济体制转型等等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问题上，都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理论创见和政策建议，为我国的现代化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为宣传经济学家们的这种贡献，并激励后学，我们特组织编辑、出版了这套《影响新中国 60 年经济建设的 100 位经济学家》丛书。丛书的成功出版，也是我们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的一份礼物。

该丛书的出版设想最初由广东经济出版社提出。因为早在 1998 年，该社就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卓元教授等的大力支持下，编辑出版了《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 10 本经济学著作》，该丛书出版后引起了很好的社会反响，并荣获第四届中国图书奖提名奖。弹指一挥间，很快就十年过去，并迎来了我们共和国的六十华诞。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出版社领导萌生了再出版一套类似的

丛书的想法。这就是我们编辑出版这套《影响新中国 60 年经济建设的 100 位经济学家》丛书的缘由。从这里也反映出了作为出版者的广东经济出版社领导的敏锐眼光。确实，在编辑本丛书的过程中，我们学到了许多，并越来越发觉到出版该丛书的价值和意义。

首先，本丛书选编的百位经济学家，几乎全部囊括了影响新中国六十年来经济建设的我国重量级经济学家。他们的知名度之高，使他们的名字不要说在经济学界，就是在普通的民众中，只要是比较关心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经济生活问题的，也是多有所闻的。因此，在这套丛书里，可以说名副其实地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间经济学界群星形象的大聚汇，也是他们的代表性研究成果的一个集中展示。这对经济学家们是一个很好的表彰，对广大读者来说则是一个难得的学习、了解我国经济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机会。

其次，本丛书中的代表作和学术简历都是由经济学家自己或者非常了解其情况的人士选择和撰写的。这就充分地保证了本丛书内容的真实准确性和权威性。从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应该是非常有史料价值的研究文献。从这些有时间顺序、时代特征和特定专题内容的文献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我国六十年经济建设和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曲折而又辉煌的历程线索，而且可以看到我国经济学家探索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思想脉络和不懈努力。

第三，本丛书中的不少论著是我国经济学研究中的经典之作。细心的读者当然会从文章的内容本身或者文章的题注和文后的一些说明中看到这一点。它们有的在当时我国的经济界和经济学界引起过激烈争鸣并产生过很大反响，有的则是对经济建设和改革发展的有关决策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还有的则得过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等经济学大奖，甚至有的文章是这三者兼而有之。可以说，其中的很多作品，虽然时光已经流逝，但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和深刻的思想启迪。它们是我国经济学文献库中的宝贵财富，对我们今后进一步开展相关领域的专题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文献资料。

盛世出华章。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繁荣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也为经济学家的成长提供了丰富的土壤。要从我国众多的经济学家中推选出大家比较公认的有影响力的百位经济学家，这是个相当不容易的工作；并且在推荐出来后，要及时全面地组织到相应的入编稿件，更是一件需要持续努力和工作量很大的事情。考虑到这些实际情况，经商量决定由《经济研究》编辑部来具体负责本丛书的组稿和编辑加工等工作，并付诸实施。我们在制定出初步的编辑出版方案的基础上，首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召开了小范围的专家论证会议，征询有关专家的意见，由此确定了本丛书的编辑主旨、特色及经济学家的入编标准等，并初步遴选出了一批经济学界比较公认的经济学家入编候选人名单。

为了使全国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不被遗漏，使入编经济学家名单更具权威性，我们还以信函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向京外共 50 余位经济学家发出了邀请，请他们来推荐认为可以入编的经济学家名单。这些积极帮助我们推荐候选人的经济学家包括（按音序排列）：陈继勇、费方域、谷书堂、何炼成、洪银兴、胡培兆、胡祖光、黄少安、黄祖辉、李炳炎、李江帆、李维安、李新春、刘少波、刘诗白、刘志彪、吕炜、毛蕴诗、逢锦聚、沈立人、史晋川、舒元、谭崇台、王珺、吴世农、夏振坤、徐传谔、姚先国、于金富、于良春、袁志刚、臧旭恒、张军、张馨、周振华、朱平芳等。

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部召开了本丛书的论证及编辑委员会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按音序排列）：蔡昉、黄达、黄范章、贾康、李晓西、林兆木、刘伟、王诚、王一鸣、吴太昌、赵海宽、赵人伟、周叔莲、郑红亮、张问敏、张永山、张卓元。吴敬琏、厉以宁因故缺席。在这次会议的讨论中大家普遍认为，百多位经济学家的专业特色各有不同，所属时代背景也有差异，因此一定要牢牢把握住入编的主要标准。首先应明确，评选时要以改革开放以后为主，以改革开放以前为辅。其次，一定要牢牢把握住学术贡献和政策影响力这两条。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委员们结合

已经遴选的经济学家入编名单和京外专家推荐的情况（如票数多少等）进行逐一论证，并以无计名投票的方式补充增加了新的入编经济学家名单，由此最终确定了入编丛书的 106 位经济学家。当然，由于时间紧等各方面的原因，确定入编的 2 位经济学家的文章最后没有能够编入本丛书，这无疑是一个缺憾。

确定入编名单以后，我们立即展开了组稿工作。我们的基本要求是：入编经济学家推荐自己的代表作 2～3 篇并撰写 1500 字左右的个人学术简历。被推荐入编的经济学家或其家属、秘书、好友等，对这项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纷纷在百忙之中积极准备所需要的资料，认真精神令人感动。可以说，没有他们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这项工作是难以按时按质完成的。

在本丛书的编辑体例上，由于历史跨度大，所选文章的形式和风格有很大的不同。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1990 年代以前的文章大多采用脚注的形式，而在之后则采取了参考文献加脚注的形式。这方面我们采取的方针是，尊重历史原貌，不强求统一。另外，经济学家们的学术简历的写作风格也比较不一样。由于丛书毕竟不是辞书，所以我们也尊重各人的写作风格，不强求一致，只是个别稿件应出版社的要求，请作者作了一些局部的调整。从出版社的角度看，这确实是一个不足，但从风格多样化的角度看，也可能是个优点。当然，如果出版时间不是那么紧，或许这两个方面能够更好地统一起来。

在经济学家的排序上，我们讨论过多种方案，如按出生年月排列，或先把经济学家按研究领域分类，然后再按某种程序排列；也曾经考虑过按照姓氏笔划排列；后经再三斟酌，同时也是根据张卓元老师的建议，我们采用了音序排列法，读者朋友们可以在时空的跳跃中，与不同时期的经济学家进行心灵的沟通与思想的对话。

由于入编经济学家大多是名人、忙人，具体承担组稿工作的《经济研究》编辑部的同志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他们通过电话、短信和电子邮件等多种方式不断地与有关经济学家或其家人、秘书等

进行沟通、催促，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才最终完成了本丛书全部稿件的组稿工作。为了争取时间，编辑部还采取了组稿和编辑加工稿件齐头并进的办**法**，来了一批稿件，就马上安排编辑人员开始审读加工，并及时与出版社沟通，解决编辑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参加组稿和编辑工作的人员有：郑红亮、王诚、张永山、金成武、王利娜、詹小洪、唐寿宁、俞亚丽、欧宏、王红梅。

广东经济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同志在本丛书的出版过程中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姚丹林社长等社领导曾几次来京与我们商量有关出版事宜。收到稿件以后，他们及时组织了社里的编辑人员集中审稿，并多次通过电话与我们讨论沟通，以使本丛书的出版能够更加完美。他们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精神，令人称道。

由于时间仓促，加上我们的水平有限，书中的不足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影响新中国 60 年经济建设的 100 位经济学家》

论证及编辑委员会

2009 年 8 月

目 录

曾牧野	1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3
体制创新：深圳特区成功之路	13
意义重大的“理论创新”活动	23
张 军	31
社会主义的政府与企业：从“退出”角度的分析	34
产权的安排和效率	49
张培刚	65
新发展经济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69
张维迎	109
是什么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增长？	113
以价格体制的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	133
张卓元	147
价格改革规律性探索	151
深化改革，推进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16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理论支柱	175
赵海宽	183
人民币可能发展成为世界货币之一	186
国有大银行也可考虑试行股份制	199
货币的流通规律	206

赵人伟	221
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及其原因	226
劳动者个人收入分配的若干变化趋势	244
中国渐进式经济改革的成效与挑战	260
钟阳胜	281
主体需要及追赶型经济增长理论问题	284
周其仁	317
公有制企业的性质	321
“公有制经济”中的企业家人力资本	340
周叔莲	359
认真研究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经验	362
企业改革和两权分离	367
再论国有企业的产权问题	381
周小川	397
社会保障：经济分析与体制建议	400
企业与银行关系的重建	438
中央计划的改革：方向、方法与限度	449
卓 炯	463
申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	467
对剩余价值论的再认识	475
破除产品经济 发展商品经济	487
邹至庄	497
关于两个线性回归系数相等性的检验	501
中国国民收入决定模型	518

曾 牧 野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创新：深圳特区成功之路
意义重大的“理论创新”活动

曾牧野，研究员，1928年生于广东揭西县。1947年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办公室负责人（筹建），广东省社科院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工业经济研究室主任、经济研究所所长、省社科院党组成员、党组书记兼副院长，硕士研究生导师，《南方经济》杂志社总编辑等职务。国务院批准的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国家级专家。

曾牧野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攻读马克思主义原著，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撰写了大量诠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习资料，并自发地独自到企业深入调查，研究按劳分配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曾牧野全神倾注于改革开放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其各个具体方面的研究，发表了150多篇论文、150多万字。1989年结集出版个人论著《沿海新潮与广东改革》、《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与广东综合改革试验》、《价格改革的目标模式及其实现途径》、《坚持市场导向改革》、《改革开放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一个县范围内试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等论文，获国家级与省级优秀成果奖。1998年，出版了个人专集《新路——经济随笔与短论集》，1999年出版了《市场经济与体制改革》。主编或参与主编的论著有：《广东省经济体制改革研究》（1986）、《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1988）、《广东社会科学四十年》（1989）、《迈向九十年代的经济特区》（1990）、《前进中的中国经济特区》、《广东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广东改革的经济思考》（1993）、《市场经济与产权制度改革》（1996）、《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与实践》（1997）、《广东二十年经济发展的理论思考》（1998）、《广东百科全书（经济篇）》、《改革开放时期广东经济学会文萃》（1994、1995、1996、1999）等。1995年与李克华、李新家等合作出版专著《邓小平市场经济理论与广东实践》（1995），获第十届中国图书奖、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精品奖和广东经济学会优秀成果一等奖。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一、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根本变革

我国人民正面临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如何加快经济的发展,当然需要解决许许多多涉及各个方面的经济政策、方针问题。但是选择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却是关系到经济建设全局的带根本性的问题。

经过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长期的实践,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四大的报告,终于果断地确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上是破天荒的大事情,是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是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正确战略选择。

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依据十四大报告的精神,我认为可以给它下这样的定义:让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一种商品经济体制。

所谓市场起基础性作用,用通俗的语言来说,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充当主要角色,让它发挥主要的作用。

这样的体制,这样的经济运行方式,同过去我们实行多年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有着质的区别。因为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让计划在资源配置中充当主要的角色。

为了说明上述观点,我想有必要对资源配置的不同方法、不同手段,进行一点理论上的说明。

任何社会都存在着一一定数量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或者说存在着一定

数量的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一般不包括未开采的自然资源）。如何把这些资源组织起来、进行合理的配置，包括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这类经济活动的根本问题，是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赖以生存、发展所必须解决的问题。因为只有解决了这样的资源配置问题，才能有效地组织生产，形成社会再生产的过程。

在现代的国家中，如何配置资源，基本上有两种方法和手段。

一是市场经济的方法和手段，即主要通过市场调节的方法来配置资源，组织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现代的西方国家，包括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般都采用这一方法和手段。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所谓市场调节，实质上就是让价值规律发挥调节社会经济活动、合理配置社会资源的积极作用。从这一基本特征出发，市场经济体制，首先要求建立以商品价值为基础、适应供求规律的价格形成机制以及由此而形成公开、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这是让价值规律起调节经济、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工作。其次，要求通过价格——竞争机制把社会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生产、流通领域中去，实行优胜劣汰原则，迫使一切企业改进管理，采用先进技术，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再次，市场经济还要求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特别是价格信号）反应灵敏的特点，促进生产与需求的协调，促进整个社会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合理调整与优化，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生产的发展，推动社会的进步。这样配置资源的方法、体制，我们习惯上称之为市场经济体制。当然，现代的西方国家实行的市场经济，也并非纯粹的自由的无政府状态的经济体制，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或多或少借鉴了社会主义国家计划化的经验，重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有的国家甚至制定了若干年的经济发展计划，采取有关的计划调节、计划管理的措施。所以说，现代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乃是在国家干预的条件下，推行有宏观调控的现代市场经济。

另一种就是原苏联、东欧以及改革开放前中国所实行的高度集中、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其基本特征是：主要是依靠行政的计划的手段来配置资源、调节社会的经济活动。实践证明，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需求是极其复杂的，而且处于经常的变动中。依靠计划手段、方法来配置资源的集中决策的体制，难于做到社会生产与社会需求的一致，而且经常发生经济发展比例失调、浪费资源的现象。计划经济体制最大的

弊端，是压抑了人的主观能动创造精神，挫伤企业与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排除了劳动者追求合理的个人利益的潜在能力。这样的体制，这样的方法，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利于社会的进步。

党的十四大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宣告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终结，标志着我们国家将按照新的体制、新的运行方式来组织整个社会经济活动。所以说，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乃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根本变革，是从低效率的经济体制、经济轨道转向高效率的经济体制、经济轨道，它将大大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

当然，这里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改革、我们努力追求的目标模式。从现实情况看，我们仍然处于新旧体制转换的过程中，距离这一目标模式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但是目标既定，也就是说这个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的根本问题已经获得基本的解决，那么我们就可以按照这个既定的目标，排除万难，加快新旧体制转换的进程，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二、经过长期探索、反复实践取得的伟大理论成果

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十四年来经过长期探索和反复实践，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断深化取得的伟大理论成果。

众所周知，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转变工作重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进行改革开放的英明决策。从那以后，我国的经济学家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就进行了积极的探索。1979年，我国少数经济学家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主张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则和方向，应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地位的条件下，按照发展商品经济和促进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自觉地运用经济规律，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当然，反对这一观点的人也是有的，他们认为尽管我国还存在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但是不能把这一社会经济的基本现实概括称之为“商品经济”。据说如果

这样做就难于分清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界限。有的学者还认为提“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经济的落脚点是“商品经济”，这样就把“计划经济抽掉了”。当时，有关部门提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商品经济”的观点比较妥当。故此，从 1980 年到 1981 年，就采用“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这是我国在认识与处理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的第一个阶段。

从 1982 年至 1984 年 10 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改提“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认为我国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有计划的生产、流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同时允许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做计划，由市场来调节，但它只是计划生产、流通的补充，是从属的、次要的，这样做才能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协调发展。在这一时期，主张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以及强调市场机制作用的观点遭到批评。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做实际工作的一些干部对“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有所疑虑。比方说我们广东，中央允许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实行某些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在发展经济方面给予广东较大的自主权，特别是价格体制改革率先进行，而且采取逐步放开价格的方针，市场调节价在价格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引进外资工作也进展顺利，越来越多的外商进来直接投资、兴办各类企业……面对着活生生的现实，许多干部不断发出疑问：“我这样做，到底符合不符合计划经济为主的原则？”我想，这样的疑虑在其他省份可能也存在。这一疑虑，反映了实际工作者对于改革开放事业所采取的某些措施、政策不落实，在改革开放问题上“前怕狼后怕虎”的心理状态。1984 年 7 月，我国个别著名的经济学家认为应该重新探索、研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应该肯定“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法，不能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应该重视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对于国民经济调节的作用。这一建议，得到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的重视。此后不久，召开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故此，自 1984 年 10 月以后，一直到 1988 年底，我国关于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采取“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法。“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靠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